



今日中国学刊，注释越来越规范，但八股气日浓。说不好听，除了编辑与作者，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，其他人一概不读。

传统中国谈文论艺，很少正襟危坐，大都采用劄记、序跋、书评、随感、对话等体裁。晚清以降，受西方学术影响，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。对此趋势，我们是认可的。但回过头来，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『学问』，抹杀一切短论杂说，实在有点遗憾。

放长视野，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。在我们心目中，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、庄谐混杂，那才好看、耐读。我们明白，困难在于学术评鉴——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『杂说』，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？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，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。

真希望我们设立的『随笔体』栏目，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，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、有性情、有趣味的『杂说』。

随笔体【“小说”如何“史学”小引】

《“小说”如何“史学”》小引

陈平原

从1998年发表《新教育与新文学》（《学人》第十四辑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12月）到2011年刊行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、2016年出版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——文学教育的方法、途径与境界》【增订版】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，我一直论述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著述方式的文学史（及小说史、戏剧史等），是如何受制于现代大学的兴起与转型的。

在中国，“小说评论”早已有之，“小说史学”则只有一百年历史。具体说来，1920年可视作中国“小说史学”的元年。理由何在？这一年的7月27日，胡适撰写了影响深远的《水浒传考证》，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版《胡适文存》；这一年的8月2日，鲁迅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讲师，专门讲授中国小说史，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台。一是发凡起例引领风气的长篇论文，起很好的示范作用；

一是现代大学新近设立的正式课程，可培养无数专业人士。
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“序言”开篇第一句：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；日后的研究者续上了一句：“有史自鲁迅始。”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第十一章称自家整理旧小说的努力，使得世人“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，与传统的经学、史学平起平坐”。经由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的积极推动，作为“学术研究”的“小说史学”迅速崛起，百年之后，已是蔚为奇观。

鲁迅、胡适开启的“小说史学”，一开始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为主；随着时间推移，中国现代小说也逐渐登堂入室。到了今天，二者分庭抗礼，大多数学者只能专攻其一。考虑到修课的是中国近代、现代、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，我所讨论的学术史视野中的“小说史学”，因此仅限于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。

即便如此,相关著述也都浩如烟海,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我选择的十二家,不一定业绩最佳,但都别具特色,很能引发思考与讨论。换句话说,这不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,希望凸显的是研究者的立场、趣味及方法。而且,这背后有北大学术传统及我个人视野与能力的限制——作为研究生课程,也只能如此了。

从1989年发表《“进化的观念”与小说史研究》(《文艺研究》1989年第5期)、《“小说史意识”与小说史研究》(《文史知识》1989年第10期)等,到1993年刊行《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),再到2004年发表《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》(《现代中国》第五辑,湖北教育出版社),我对小说史研究的策略及方法多有思考。遗憾的是,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,我不再从事小说史研究,很多最新成果没有阅读,不少议论也就难免偏颇。好在对于整个学界来说,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从来都只是“偏师”,此课程(及《文艺争鸣》的连载文章)若能呼唤更多新人登台表演,则于愿足矣。

讲课不同于著述,有时长篇大论,有时点到为止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同时,得保持一定的空气与水分。两节课全是干货,会让人听不下去的;必须张弛有度,方能维持听众的注意力。灵活多样,且讲究节奏,这是课堂的特点——可以引述自家著作,开列参考书目;也可以穿插闲话,兼及师友逸闻。并非严格的专业论文,更接近于学术随笔,兼及个人感受,从书里谈到书外,如此琐琐碎碎,不登大雅之堂,却能使研究对象更加血肉丰满,对听课的学生来说,这些书本以外的“闲话”或许更为难得。

因新冠疫情,北大改为线上教学。对着空荡荡的镜头宣讲,不再与学生面对面,无法交换眼神,不仅不精彩,且容易忘词。为了备忘,我写下了部分讲稿或详细的大纲。课后意犹未尽,干脆整理成文,交给《文艺争鸣》刊发,也算是对这一特殊时代、特殊课堂的纪念。

2020年3月1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随笔体【“小说”如何“史学”之一】

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

——关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
陈平原

讨论现代大学与小说史学这个话题,我想围绕鲁迅(1881—1936)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来展开。今天的演讲,主要依据我前些年撰写的若干文章,删繁就简,讲述一个教育部官员,如何因缘凑合,应蔡元培之邀前来北大兼课,竟然成就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名著。这里牵涉很多有趣的问题,值得细究。

一、一段公案

鲁迅去世的那一年,也就是1936年,鲁迅撰写了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后记,其中有这么一大段:“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日译本的序文里,我声明了我的高兴,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,是经十年之久,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。当一九二六年时,陈源即西滢教授,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,说我的这一部著作,是

窃取盐谷温教授的《支那文学概论讲话》里面的‘小说’一部分的;《闲话》里的所谓‘整大本的剽窃’,指的就是我。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,我的也有了日译,两国的读者,有目共见,有谁指出我的‘剽窃’来呢?呜呼,‘男盗女娼’,是人间的大可耻事,我负了十年‘剽窃’的恶名,现在总算可以卸下,并将‘谎狗’的旗子,回敬自称‘正人君子’的陈源教授,倘他无法洗刷,就只好插着生活,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。”⁽¹⁾所谓“让他们怨恨去,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”的“临终遗言”⁽²⁾,当然包括这位多年论敌陈西滢教授。

1925年11月21日,陈源在《现代评论》上发表《闲话》:“可是,很不幸的,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。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,在地面上寻找窃贼,以致整大本的剽窃,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。要